

两件敦煌道经残片的定名

王 卡

本文讨论的两件敦煌道经残片分别为启功先生和中国书店收藏。

—

启功先生是当代著名的书法家,生前因研习书法艺术的需要,一直喜好搜集古代碑帖及经卷写本。他的珍藏品在其去世后,由王连起等人整理编成《坚净居丛帖》十册,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6月出版。该书第十册《敦煌写经残片》中,刊录了170枚敦煌写经残片的图版。这些残片原被装裱成两本小册子,可简称为甲本、乙本。甲本封面题名《敦煌石室写经残字》,题下注“己未(1919)春得于兰州”。内有24页图版,贴入36枚残片。乙本册首题名《唐人楷书残纸》,题下注记:“乙未五月粘存,七年前得自方氏。启功记。”内有25页图版,贴入134枚小碎片。

关于这两本小册子的来历,据柴剑虹所撰此书后跋《启功先生的随身宝》考述:甲本内有张广建、许承尧两人的题跋和印章。张广建(1867-?),字勋伯,安徽合肥人。1914年出任甘肃省都督、巡按使(1916年改称督军兼省长),1920年去职,在任期间曾非法攫取敦煌写经数百卷。许承尧(1874-1946),字际唐,别号菴甫,安徽歙县人。清光绪甲辰(1905)科进士,1913年随张广建从京入甘,历任省政府秘书长、政务厅长、渭川、甘凉道尹等职,在职期间亦攫取敦煌写卷甚多。许承尧是清末民初书法家和收藏家,鉴识不凡,又是张广建的同乡和部属,有向上司奉赠的缘由。据启功所藏甲本小册内的题跋及印章推测,该册原应为许氏藏品。在张去职前一年即1919年,许将此册奉送。张的藏品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寓居天津时逐渐流散,大部分精品为日本三井文库所得。此册因是残片汇贴,不被人看重,流落北京琉璃厂待沽,启功先生慧眼识珠,以廉价购得。

乙本残片的来历,启功题记曰:“乙未五月粘存,七年前得自方氏。”乙未即1955年,之前七年即1948年。方氏当系方懿枚,字子才,安徽黄山的商人。上世纪三、四十年代,他在北京购得不少敦煌残片,据说大多原为李盛铎旧藏品。方氏又将残片转卖他人。据方广錡先生说,安徽博物馆石谷风先生经黄宾

虹先生介绍购得 80 多枚残片,后编为《晋魏隋唐残墨》出版^①。琉璃厂中国书店所得的《敦煌残拾》残片册,近年编入了《中国书店藏敦煌文献》^②。启功所得的这部分方氏残片,由他粘贴成册,此次也刊入了《敦煌写经残片》书中。据说目前还有些方懿枚的旧藏品,由国内某位收藏家保存,尚未公布^③。

本书中刊录的所有残片影版,都未经定名。有些残片首尾有收藏者添加的题跋,多是鉴定写本的字体、书写年代和品质。大概收藏者是书法家,更重视鉴赏写本的艺术价值。至于其文献内容及价值,则有待考订。现在看这些残片的内容,与其他藏家的藏品同样,绝大多数是佛经写本,只在甲本册末(本书第 28 页)有 1 枚道经残片。此件首尾无题,唐写本,有乌丝栏。楷书,书法精美。卷末左下角钤“黄海春父”朱印(此系许际唐印章),卷背有僧人杂抄。正面存经文 10 行。据笔者查考,此残片是《洞渊神咒经》(以下或简称《洞渊经》)卷三《缚鬼品》写本,其内容大致见于《中华道藏》^④第 30 册第 11 页上栏,但抄本与《道藏》本的文字颇多不同。又从笔迹看,此残片与 P.4676 残片原是同抄本,两件间有 1 行缺文,可据《道藏》本拟补。缀合后存经文 41 行(10+1+30)。录存原文如下:

道言中国罪地恶人聚生六夷偏偏自共相残/
至壬午年已来天下浩浩四方大动六夷伐王民/
人不安刀兵疫煞害恶人恶人不信大法/
故令死耳自今有奉三洞之经者自得上/
仙耳世人愚痴见道士亦死恶人亦死不知/
分别有异直见同死自有无异也不尔也/
恶人死者入三涂恶道道士死者生天上人间/
或为大王若便仙去终不生恶处也身上白/
日仙者千年可服药仙住年也故有奉三洞/
尊师受经苦身行道升仙万劫无有死时矣/ (启功藏本止)
自今以去若有道士救人之处魔王共收缚/ (据道藏本补)
鬼矣/ (P.4676 起)
道言吾昔为中国仙人授经东岳直连子等/
来受之各各持信受之具白绫五疋青布/ (以下略)

启功收藏的这枚道经残片,不仅书法极佳,其文献价值也很重要。我们知道,《洞渊神咒经》约出于东晋末刘宋初,是南北朝隋唐时期流传较广的道经。

①安徽美术出版社,1992 年。

②中国书店出版社,2007 年。

③参见方广錡《中国书店藏敦煌文献序》。

④华夏出版社,2004 年。

其原本为十卷,大约唐代晚期被改编增补成二十卷。现存明《正统道藏》收入的二十卷本,即唐代的改编本。由于《洞渊经》的内容涉及东晋十六国战乱时期下层民众的信仰,以及晋宋之际道教从民间教团上升为官方宗教的一些历史事实,因此近现代中国及国外的许多道教史学者,都很重视对此经的研究。但在敦煌道经发现之前,人们并不知道此经的早期文本状貌。经过近几十年中外学者的持续研究,截至目前在敦煌吐鲁番遗书中,已考定出此经的抄本三十多件。十卷本中的多数卷次,或有首尾完整的抄本,或有多件同卷的残抄本,可校补成基本完整的经卷。唯有第三卷,此前只发现一件 P.4676 号残片,仅存 30 行经文。这对研究《洞渊神咒经》的文本及内容甚为不便。启功所藏《洞渊经》卷三残片,虽仅存 10 行经文,亦可稍微弥补一点缺憾。

《洞渊神咒经》虽有完整的《道藏》本二十卷,但据学者们考察发现,《道藏》本与敦煌出土的十卷本,在文字上差异甚大。不仅卷数相差一倍,而且在前十卷的相同卷次中,道本与敦本的文字、符篆也多有不同。看来后代的改编者对《洞渊经》的原本十卷作了较大的删节和改编。据日本学者吉冈义丰、大渊忍尔等人研究,现存《道藏》本的前十卷及第二十卷后半部分,应为唐以前《洞渊经》十卷本的内容。目前发现的敦煌抄本主要是前十卷,第二十卷也发现了两枚小残片,证明日本学者的结论基本正确。但我们目前已知的敦煌吐鲁番《洞渊经》抄本件数,要比两位日本学者所见的多出不少。这是近年来因敦煌藏品的新图版不断公布带来的研究进展。但愿今后能考出更多《洞渊经》卷三、卷二十的抄本,以便完成对《洞渊经》的校补工作。

最后要说的是,启功所藏《洞渊经》残片与法藏 P.4676 原是同一抄本,证明由许承尧编辑,然后奉送张广建,最终归启功先生收藏的敦煌残片册,其中的残片都应出自莫高窟藏经洞,可以排除假造的嫌疑。

二

北京宣武区琉璃厂,是京城著名的文化市场。这里有不少经营中国古代文物、古籍文献,以及民间传统工艺品的商家店铺。坐落在琉璃厂西街的中国书店,是一家专门经营中外古旧书刊,搜集整理和出版古代文献典籍的著名文化企业。二十世纪下半叶,中国书店在搜寻古籍文献的过程中,陆续采集到一批敦煌文献。进入新世纪后,于华刚、马建农、彭震尧、吕志强等人组成的编委会,对店藏敦煌文献进行整理,选择其中部分文献价值较高的藏品图片,编辑成《中国书店藏敦煌文献》1 册,中国书店出版社 2007 年 8 月出版。书中刊录 ZSD 编号写本图片,共计 93 号。其中大多数是佛经写卷,也有几件道经及其他文书。ZSD043、ZSD054 两件编号,都是道经残片(影版见该书第 148、153 页)。ZSD043 号题名“道教文献(待考)”,ZSD054 号题作“灵宝自然斋行道仪(拟)”。该书后所附《图记》中,有两件残片的释文。笔者近日研读此书,发现两件道经残片的定名和释文都有点问题。

ZSD043 残片首缺尾残,无卷题。唐写本,楷书精美,有乌丝栏。纸幅 24.5×12.1cm。残存经文 7 行,每行 17 字。据查此件应为隋唐之际问世的《太玄真一本际经》卷第二付嘱品之残抄本。此卷经文收入明《正统道藏》太平部,敦煌遗书中迄今已发现多个抄本。连同此件残片,共计有 25 个编号。其中法藏 P.2393 号抄本首尾完整,可作为本卷经文的标准本。ZSD043 残片所存经文,见于 P.2393 抄本第 187 行“何以故”句,至 193 行“譬如有人虽服甘露”止。再看此件残片笔迹,酷似俄藏 Дх00541 残片,文字内容亦衔接,原当为同一写本,两件缀合后存经文 21 行(7+14)^①。从笔迹看,ZSD043+Дх00541 残片与另一件俄藏 Дх10431 残片(存经文 15 行),亦当为同一抄本,但文句不能连接。关于中国书店藏品与俄藏品缀合的意义,详见后文。先录存残片原文如下:

何以故能愈病者乃名为药是智慧药从正/
教生是故正教名为慧药此经非但能治或/
病亦能发生妙善之法能使学者到常乐处/
不死之官譬如甘露有服之者终无横死长/
命延年此经如有服行者必得常恒安乐/
之命若有不能巧方便学一向作解而起执/
滞更增烦恼不保长生譬如有人虽服甘露/(ZSD043 止此行)
不能将节伤损药性反致毒伤是故应当于/(Дх00541 起此行)
正法门深解方便随宜取悟证甘露道是乃/(下文略)

ZSD054 残片,唐写本,行楷书,有乌丝栏。原件断裂成五枚小碎片,首尾及下半段缺损。其中碎片 A 存 7 行,碎片 C+E+D+B 文字可缀接,合计存 3 行。2006 年,学友方广錡发来此残片录文(当时拟编号为北疏 43),托笔者考订经名。因当时未见到图版,无法缀接,只能据残存文字内容,推测当系道教灵宝斋或塗炭斋之上章文,故拟名“道教斋仪残片”^②。近日见到书中图版,经仔细比对,发现原件中 C+E+D+B 四枚小碎片可拼合成 3 行,文字内容为道教灵宝斋宿启仪的发炉上章文,大致见于北周道书《无上秘要》卷四十八《灵宝斋宿启仪品》^③。按宿启仪是道教灵宝斋的行道仪式,在行斋前夜先举行建坛请神仪,为次日上午举行的“明旦行道仪”作准备,故名“宿启仪”。南北朝隋唐时期的道教灵宝斋法,如金篆斋、黄篆斋、自然斋,都有宿启和行道仪,其仪文大同小异。《无上秘要》卷四十八所载灵宝斋法,即属于灵宝自然斋仪。将此件中碎片

① Дх00541 残片,影版见《俄藏敦煌文献》第 6 册(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6 年)。大渊忍尔《敦煌道经目录编》著录此件,纸幅 21.5×24cm,优质黄纸,首行起“不能将节”,相当于 P.2393 抄本第 193 行末端至 194 行首。从纸质、笔迹和文字前后衔接等方面判断,ZSD043 与 Дх00541 号可直接缀合。

② 参见拙文《敦煌道教文献研究目录篇补正》,《敦煌学辑刊》2007 年第 3 期。

③ 参见《中华道藏》第 28 册第 175 页下栏。按此页中“玄元始三气”改作“圆元始三气”,避宋讳。可知现存《道藏》本已经宋人改动,故与敦煌残片中文字不完全一致。

C+E+D+B 拟名为“灵宝自然斋行道仪”，应没有错。至于碎片 A 的文字，笔者尚未查到出处，但从残文笔迹及内容看，也应是灵宝自然斋的上章文。

本书《图记》中此件残片的录文有些讹漏，而且分作五条碎文，令人不知所云。今参考《无上秘要》，重新录文如下：

经行□…□/

臣等□…□/

大道至□…□/

太上灵宝□…□/

众等上启虚无自然□…□/

太上老君□…□/

至真诸君圣□…□/(下缺)(碎片 A 录文)

帝直符直日香官使〔署〕各册六人出关启此间/

土地理域真官正〔神〕臣等□…□/

场之下臣今正尔烧香行道□…□/(下缺)(碎片 C+E+D+B 录文)

关于以上两件残片的来源，据方广錡先生所撰此书序文，此书所收文献图版中，有合装成册的一组 27 枚残片，原题名《敦煌残拾》，前有 1951 年黄宾虹先生的题记，说明此残片册原是方懿枚的收藏品。ZSD043、ZSD054 号道经，即其中的两枚残片。由于这些残片篇幅不大，过去曾有人怀疑它们或许属于吐鲁番出土遗书。但近年来的研究已否定这种说法。

大约 2001 年前后，笔者受方广錡先生之托，考订《晋魏隋唐残墨》中刊录的两件石谷风所藏道经残片的经名。据查《残墨》第 53 页刊录的 048 号道经残片，应为东晋所出《灵宝度人经》的唐写本，残存经文 6 行，见于《度人经》标准写本 P.2606 号的第 70-75 行。残片左上钤有方形阴文朱印“黄山方/懿枚藏/晋魏隋/唐残墨/”。又发现该残片第 1 行前有残字笔划，可与英藏 S.6076 号残片的末行缀合。这为鉴别方懿枚藏品的来源提供了一个直接证据，证明它与斯坦因所获英藏文献同出于敦煌藏经洞。据石谷风先生告知，方氏这批残片大抵为李盛铎旧藏，因此它们为研究李盛铎藏品的流散也增加了新知识。方广錡认为这是一个有意义的发现，并将他的研究结论写入《晋魏隋唐残墨缀目》^①。

《残墨》第 65 页刊出的 060 号道经残片，据查是东晋所出《洞真高上玉帝雌一玉检五老宝经》的唐写本，残存经文 7 行，见于明《道藏》所收该经文第 8b10 行至 9a6 行。此号残片石谷风先生原题“唐九天帝君道经残段”，大概因残片中有“九天帝君”名号而致讹误。此外，《敦煌遗书总目索引》据日本《昭和法宝目录》著录的散 0930 号抄本为“唐九天洞玄经一卷，内藤虎次郎藏”。按此件经名可能也是误题，原件应为《雌一五老经》的唐写残本。石谷风藏品

^①《敦煌吐鲁番研究》2002 年第 6 辑。

与内藤虎次郎的藏品是否同一抄本的两截？如果是这样，就多了一件证明方懿枚旧藏品出自敦煌藏经洞的证据。可惜内藤氏藏品的原件今已下落不明，这个问题我们只能先存疑待考。

此次笔者考出 ZSD043 号残片是《本际经》卷二的唐写本，又意外发现它可与 Дх0541 残片缀合，并可能与 Дх10431 原属同一抄本。按中国书店收藏的两件道经残片，是方懿枚旧藏品^①，其中一件能与奥登堡所获的俄藏品缀合。因此我们又得到一个有力证据，证明方懿枚藏品出自敦煌藏经洞。众所周知，学术研究忌讳的是仅凭孤证就下结论。现在我们有了第二个直接证据，看来方懿枚藏品出自藏经洞，应该是确实无误的结论了。有意思的是，方氏旧藏品多数都是佛经写本，但对其中仅有的几件道经残片加以考订，却为鉴定这批藏品的出处提供了有力证据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

^①据原书《图记》著录，ZSD054 号残片附纸铃有“黄山方/懿枚藏/晋魏隋/唐残墨/”阴文方形硃印。可知中国书店藏品与石谷风藏品同样购自方懿枚。